



诗禅证道

“贬官禅悦”和后期唐诗的“人造自然”风格

王树海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安史之乱”后，唐代诗人的“士宦禅隐”生态渐渐消退，逐而为普遍的“贬官禅悦”所替代。

唐前期诗作那种亲和自然、契合自然、传达自然、几近本然的创作情态，和那种不期而然的自然诗风表现，成为唐后期诗作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是一种理想的标的。

唐后期诗人在摆脱非自然的种种努力中多所“用力”，而不断用力的结果，是以诗风的日益人造化为代价的。

禅旨玄远，诗道微茫，可见一斑。

上架建议：文学·学术

ISBN 978-7-80225-307-0



9 787802 253070 >

定价：32.00元

诗禅证道

“贬官禅悦”和后期唐诗的“人造自然”风格

王树海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禅证道：“贬官禅悦”和后期唐诗的“人造自然”风格 / 王树海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225-307-0

I.诗... II.王... III.唐诗—文学研究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6262号

诗禅证道

——“贬官禅悦”和后期唐诗的“人造自然”风格
王树海 著

责任编辑：罗 晨

装帧设计：段 芳

责任印制：韦 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10 1/16

印 张：19.2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07年7月第一版 200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307-0

定 价：3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辛巳新正，摄于安达曼海
与马六甲海峡汇通处

庚辰岁尾，罕见的“白毛风”从阿尔泰裹挟着冰雪一路南下，北国皑皑，漫天皆白。家族亦遭受欺凌，顷刻之间，痛失侍仰，该年冬至，是兄妹五人永难忘怀、不敢提及的日子，心地久久沉在冰点下。丁巳新正，奉命赴西马讲学，行前心境仍难自抑，掬抚之失，何以平慰！飞机升离地面，城镇村落、江河山野迅疾往窗后流去，当其拔上万米高空，进入南中国海、东南亚领域之际，群峰似的絮云高深不测，像凝固的时间寂然不动，不时有飞机从旁侧经过，平稳自信从容不迫地入出云山；傍晚时分，太阳挂在舷窗外，不升亦不落，朗照着天宫，庶几以为进入了佛境，心始有慰，稍有觉悟焉：

掣电追风超音速，江山次第窗外流。
拄地云峰寂万仞，抟天酣日耀千秋。
碧楞伽山慈悲储，青白马寺般若留。
佛母原来自家内，不劳碌碌四壁求。

前言

动问诗是什么和追问什么是美一样，具象可赏，总名难名。佛门问禅，总体的回答亦“如一器倾出复入一器”，囫圇吞囫圇难得底细。对于诗、禅具体而微的诠释，也还是人见人殊，“诗无达诂”，“禅无究竟”。从佛禅入手，从“安史之乱”后诗人普遍奉行的“贬官禅悦”入手，悉心探取诗歌创作的特质、规律，曾引动起长久的热忱，在寻索征询的途中时有所见，偶或俯拾而兴奋亢奋，继而生成更大的诱惑。佛禅之于本体的体悟和那近于冷漠的“零度”表达，其吻合真实的程度却让人惊诧；诗歌之于世界高密度情感的倾与传达，却也是最为准确的把握，时空的反映最是信史。佛道幽深，诗禅微茫，由是可证一斑。

一、自然的把握与更亲近的方式

非人为的存在是自然，所谓“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这自然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朴初的认识，自然者，天然也。随着人类的进化进行，对于自然的认识提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然观，相对于儒家、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来说，佛禅的自然观呈现为一种圆融完美，此中的理性包容博大，经得起理性的批判与颠覆。佛禅的自然之“道”何指，极而言之曰“心”，这是一个精神性的绝对本体，道家老子那个玄冥难能指实的“道”，尽管“玄之又玄”，也仍然是一个物质性的绝对本体。这个“道”所包纳的一切，也都可以融入佛禅

之“道”，连“道”所师法的道家的“自然”，也无不是佛禅之“心”的包容之物，佛禅称“汝即梵”，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世界，你就是整个自然，证悟得自然，即证悟了本心，而佛禅修持的任务就是得“心”见“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从佛禅之道来看，“心”与“自然”之间就获得了一种不可间离的融汇。

这种自然观、世界观之于诗人墨客的吸引包含诸多层次的原委。首先是生理本能的依恋，人作为自然之子和自然的联结千丝万缕，可谓脐腹相连。西方的基督教也认为：“当永生的感觉在我们心中朦胧暗淡的时候，恢复我们永生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观赏美景”^[1]，到大自然中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汲取生的力量。如果说这只是一种自然的自为情态，还有理性清醒的自觉，人们厌于尘世的嚣繁和倾轧而召唤自然，亲切自然，获得安全或安全感，自由或自由精神。这种行为的信仰尊奉往往来自佛禅，尤其是风行于有唐前期的“士宦禅隐”，以王维为代表的“禅隐”诗人所找到的亲近自然的最佳方式，就是对于自然心灵的靠近和诗的传达，他们“隐”于“宦位”，“隐”于“朝堂”，衷心却怀抱着自然，是心灵世界难以樊篱的依恋，而一旦有缘躬亲山水，置身自然时，则是相互间的吹映低语，是贯彻身心的互融，而“士宦禅隐”的诗人，其清醒在于，崇奉向往着自然性情，当下主要还是一个社会人，在这个舞台他必须接受、履行“人”的全部内容和任务。早就“倦于仕途，厌于奉制”的王维，之所以“沉吟未能去”者，首先想到是“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之“人情翻覆似波澜”，感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似是别无选择。然而，这不过是王维精神、灵魂的遁逃藪，这里的“自由”“自在”属于诗，精神、灵魂对“世累”、“时累”的摆脱，使诗人靠近、走向了自然，自然成为理想的境界召唤，因而亲近自然，传达与自然交游的种种细节和感悟，就成为“士宦禅隐”者一种持久的欲望，因而，他们的诗境，绝不同于儒家理学家“天且不言人代之”、“天不能歌人代之”那种“有待牵后”方能与自然建起联系的境界。他们以禅家的“本来”之

“心”，得以与天地自然印合，与天地“自然”“打成一片”。“王维证时符水月”，正是这种层次的意义，意谓其“心”所证，符契自然。

本书学术针对之“自然”，是指涉禅人在传达“自然”时，所呈现的诗风的自然，诗作那种“因行生变”，“因动生文”的“不期而然之妙”。那种“风来树动，雨过山青”般的表现诗风，唐前期“士宦禅隐”阶段的王维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不论是其“偶然作”抑或“走笔成”，均任自然，一片神行，似乎未著些微人工的气力，只是自然的原态。然而，这几乎又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精神状态之记录的诗，从其酝酿、生成，绝不能完全听凭自然，谓其自然，只是程度的比较而已，因而，它只具有相对意义。王维在符契自然，传达之自然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也只是“天人相半”，那种有意无意间的追求与努力，也还是一种“有意”的功夫。人们之所以喜爱、追求这种身心的自然化，传达的自然化，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走向非自然而形成的。因而有人称，诗与文学是对既往的“追悼”，甚至认为诗与艺术是不可能“进化”的，它只是对自然本真、本心的呵护，“当文明增进之时，诗必然会衰落”^[2]王维诗歌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主要原因亦正在这里，唐后期诗人因渐而远离王维所具有的种种条件，而仍欲达到那种与自然的亲和程度和那种不期而然的传达效果，则“必须用力”，那种认真的“炼饰”，“五伐毛，三洗髓”般的苦吟，亦即其不断“用力”的结果，是诗歌自然风格的日益人造化。

二、非佛禅因素的佛禅原因

后期唐诗发展到大历、元和年代又起了高潮。前辈诗人的艺术影响力直接发挥着影响，“安史之乱”过后的心理惊惧和社会萧条也是一种强大的刺激。钱起“文宗右丞”，韦应物则慕王维而不事声张，刘长卿匆匆忙忙地归隐，又迫不及待地复起。这些继武接绪者与佛禅的关系情态，时作“士宦禅隐”，时作“贬官禅悦”。大历至贞元年间，值得关注的该是韦应物，诗风闲雅清老，古淡出新，诗句“落叶

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被认作禅宗的三种境界其一，是大历诗坛上一个卓异的个案。

元和时期是“贬官禅悦”的典型时期。诸诗子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贬官，不管是寻求思想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庶几“既贬则禅”，尤其是他们的贬谪地又是南宗禅的发祥、盛行地区，亲和佛禅就显得甚为自然，颇合逻辑。此间，诗歌成就显著当时、传诸久远者当推刘禹锡，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以“诗豪”见著于世的刘禹锡之于佛禅命意有着深刻独到的颖悟与理解，世界呈现的“恒在性”，使其悟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旨在见性归心，有此依傍，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其传世著名的《金陵五题》、《西塞山怀古》和其得“氓谣俚音”所创例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甚或《浪淘沙词》，均是鲜活生动的证例。晚年的胡适之曾对门人讲到，要看一个人诗之优劣，“先看他的绝句，绝句写好了，别的诗或能写得好，绝句写不好，别的一定写不好。”^[3]这该是很有见地的。按废名先生阐释，绝句之妙，在于它是真正的“诗的内容”，绝句“多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的”，有些诗“要等写出来以后或等数日乃至数月写出来，才告完成的，这不是真正的诗，只是“诗的形式”而已。”^[4]综观刘禹锡之人情诗性和其诗风表现，之所以佳妙，亦正在于“诗的内容”的真正支撑。刘禹锡之于佛旨的透辟理解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俾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似议非议，有论无论”，如其《浪淘沙词九首》（其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虽衔议论，总体上仍旧是诗的整体感悟，仍是道地的“诗的内容”。

诸论者察到“禅进诗退”现象，似乎不无道理，深长思之，未必如是，精致透彻的理性认识，未必给诗歌创造带来麻烦。所谓“禅进诗退”，多半是对诗风崭露的人工气而言，那种退步、蜕化，往往由于“人力”的刻意，“人意”的苦求。此种风气在元和诗坛并不浓烈。柳宗元诗中“人意”虽有所施，虽是“毕竟不和平”，但其诗风

表现仍以“简古”“淡泊”的基调为主；白居易诗风追求则着意“浅切”“平易”，以致被讥为“浅俗”。平易性虽不失为一种自然化的风格，倘或用力太过、太勤，也影响诗作的艺术质量，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并认识到自己“所长在此，所病亦在此”（《和答诗十首序》）。

真正由“非佛禅因素的佛禅原因”生成的“人造自然”风格的代表诗人此间有两位，一韩愈，一贾岛。韩愈以“攘斥佛老”自命，以“谏迎佛骨”获罪南贬，细究本末，人们发现其“宣言”与“行为”不一，其“依违两间”的姿态是生存策略的需要。他反对朝廷“迎佛骨”，首先考虑的是朝廷大倡法门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这还是一种政治态度。既贬后，却广交僧众，“频作赠浮图诗”，这亦是那个时代的惯常逻辑：“既贬则禅”，因而人们在诗中、行为中看到：“退之表面所拂者僧迹，里面所心折者佛理”。所谓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则直接获益于佛经和佛经翻译过程，因而，本书仍从“佛禅的原因”对其诗风表现进行追究。

从“苦”功“用力”的角度着眼，自然诗风的人造化似乎之于贾岛更相宜。以“苦吟”名世的贾岛因“推敲”锻炼诗句痴撞韩愈“节仗”，是诗歌史上久久传诵的佳话。然而韩贾际会，却是贾岛尘俗遭逢甚或诗风形成的最初原委。贾岛孩童时节即成为实在的“我佛弟子”，得遇韩愈携还尘欲应举，却屡试不第，为仕进忙碌一生，苦吟一生，穷困一生，终生潦倒几无光明，最终客死“传舍”。尽管历史不接受假设，设若贾岛未曾得遇韩愈怜惜，他肯定不会像历史实际那样，“初心”未宁地度过穷困凄惨的一生，亦即谓贾岛一踏上仕进之路，悲剧命运即已注定，何以“终身不第”，原因大致两端：第一，他自幼入空门，直到三十四岁才更张而转习仕途，在人生学习的关键时期接受的根本教育是佛家的，所以人们看到“贾岛衲气终身不除”，与尘俗隔离三十多个春秋，要改换一种思想逻辑系统，终非易事。第二，在方式方法的操作上，亦“不善程式”（《唐摭言》），他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矛盾体系中。明明是不可为之事而刻意为之，于是悲剧结局已是定数，“年年名场”却终身不第，“日日攻诗”而“初心”未

宁，“衲子”未得衲子心，这是贾岛诗风形成的外缘。“诗的原因”则是由于诗人欲矫“浮艳”诗风、时风的大愿和艺术实践磨砺所造成，欲“矫”之，则必示范之，诗人只能诉诸“苦吟”，这种人工所为，渐次形成了以“苦涩”为核心，逐而漫衍开来的“险僻”、“清奇”、“淡瘦”之个性风格。有人称“士宦禅隐”阶段的诗人具真正的烦恼，即情即兴抒发，因而诗风自然，“贬官禅悦”阶段的诗人是找寻到的烦恼，做出来的表情，所以自然的诗风里亦有掩饰不住的人工气。

三、盛世才情与末世的尴尬

唐朝末期，由社会所引发的排佛、毁佛运动，却使整个佛教队伍加快了禅宗化进程，尤其是唐武宗制造的“会昌法难”，让佛教诸宗看到，唯禅宗之修持方有光明的未来。会昌“难”后，随之而来的是黄巢造反，义军所到处，佛寺禅院尽在剥夺之列。这只是资产的劫掠，至于佛理禅旨、人生观及其生存的社会根源，则无一触动，在如此的境遇里，完全容不得从容、自然，敏感的诗人意识到，此际，已届临让人莫之奈何的末世。

在诗风表现上，原先的“用力”已变为“费力”、“必须用力”，因而整体的诗风衰飒和日渐浓重的人工气息，笼罩着唐代末期的诗坛。如果仅从个人秉赋、资质考鑑，唐末诗人并不乏盛世的才情，却难免末世的尴尬。例如司空图、杜荀鹤、郑谷等，甚或马戴、李频、胡嘏、李洞诸人，都具备相当的才气实力，只是“来不及”而已。面对人们之于唐末诗歌既久的指陈鄙薄，有一种声音颇耐人寻味，即称唐末诗“不必妙”之论。“不必妙”，道尽了唐末诗的“妙”处，道尽了唐末诗的全部曲衷。称其“不必妙”道出了末世诗人之于政治时局的无奈，他们不可能像唐前期先辈们那样在“富贵”、“山林”间任情选择，不能优游从容地吟咏心胸内外的山山水水，边塞的豪雄、田园的恬适、宫苑的高华成为不复再现的过去，然而他们依然爱诗爱美爱生活——诗的表现，大大地缩小了驰骋的天地，更多地回到小圈内，题材琐屑，境界变窄，费力刻意而气象趋小，诗风衰飒，谓其自

然亦是人工打磨过后的自然。

郑谷诗歌成就是唐末诗歌成就的代表，同时也毫不含混地承载了末世的尴尬。郑谷早年得“唐末完人”司空图指教，期许甚高，俟其走进诗界，诗作几曾被讥为“格调卑下”，郑谷自己亦觉“无僧格卑”，竭力以“僧”医“卑”，成效斐然，诗风表现为“清婉明白，不俚而切”，诗作《淮上与友人别》，令人久诵不厌。称为“盛唐风格”，“酷似龙标、右丞笔墨”。总而言之，诗人以僧医卑的努力也只是一种“末世诗情”，其饱经离乱，居官而闲的生活态度，既体现其禅学风貌，又规定了其诗学水平。

本书之于唐诗的分期仍不取“初、盛、中、晚”之定例，而径以“前期唐诗”、“后期唐诗”分别，理由陈述可参见本书上篇第一部分的注文，此不赘。前、后两期之分的界点，大致准于“安史之乱”（755~763），如此分期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文化学术、宗教信仰乃至朝野心理诸方面，“安史之乱”都是一重要转捩点，大唐帝国由此开始了衰亡的历程；书末附录所收的七篇论文，是笔者乃至弟子多年来围绕佛禅与诗文的总课题进行的个案专题研究，篇幅或长或短，时间或近或远，拣择汇集于此，意在免除在研时段的前因陈述之劳，此后去向的描述亦可作在研时段结果的印证，为己所洞开的方便之门，多是惦念能看到该书的读者。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人们之于韶光不舍昼夜地逝去，无能为力，无以为计，它似有情又无情，终是抓握不住，愈是不能，愈是为之，古往今来、中外古今的诗文大半是缘于它的海叹。时至今日，“十一·五”的第一个年头行将过去，笔者还在做着“十·五”的项目。题目蕴含的题旨，一直是“做”的根本鼓舞。禅旨的远，诗道微茫，全副武装的努力正印证了诗、禅谜样的幽妙。

自由的意识的人，一直不停息地追问种种“本质”，亦包括人自己。面前的存在，身后的背景，纷纭众说，众说纷纭，“真理”现身还有“真理”，“假说”而后仍然“假说”。人们禁不住拷问，这个世界的凭信、资证究竟是什么！微观的“原子”们不是，它只存在于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宏观的宇宙和眼前的“存在”呢？也不是，对一般

人来说至少“有时不是”，例如“我的花园”，“当我在花园中享受着初春的新绿时，只要我一闭上眼睛，花园就马上从宇宙间消失了。我的眼睑竟然可以像断头台的利刃，一下子就把花园从世界中砍掉。当我再睁开眼睛，花园又马上重返现实了。”何·奥·加塞尔（José Ortega Gasset）从视觉的运用、闭合以及梦中、幻中审视“我的花园”，对宇宙产生了疑惑：“如果花园是这样，整个外在世界是否也可能这样？我是否生活在一个摸不着边际的幻觉中？”宇宙的凭据到底何是？回答是“我的牙痛”。“不管宇宙之中有没有牙齿存在，只要我感觉到牙痛，‘我的牙痛’就无可怀疑地在宇宙中存在！”^[5]他把思想，把“我”，“我的感受”亦即“人的感觉”作为宇宙的基本事实和出发点，是一种活着的清醒，是对生命满怀感恩的妙解。

生命世界是美妙的，人们之于“本质”的找寻，犹如迎着阳光寻觅太阳，奔着狐鸣抓捕狐狸，你迎着阳光前行，越走越觉眩目失辨，何方何位，日近日远，终不得之；闻狐鸣而趋之，宛尔在前，倏忽其后，寻寻觅觅之际，让人体悟到狡黠可喜而无所捕获。有生命即存诱惑，有诱惑即生动力，佛家称喻生命是“一股振动之流”^[6]，像浪波一样，前前逝去，后后生起，生命就是过程，是连绵不断的过程。人们之于诗、禅的追问，是让“过程”充实，法喜充满，努力于过程之中，保持对完美“答案”的渴望，不管劫难几何，但求生意几许，生命宝贵，为人骄傲，西面上帝“无所不知”，人外动物“一无所知”，人，只有人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

注释：

[1]〔美〕詹姆斯·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三联书店。

[2] 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

[3] 胡颂平整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4] 《新诗十二讲》，辽宁教育出版社。

[5]〔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

[6]〔缅〕葛印卡：《生活的艺术》，台湾内观教育基金会。

前言 / 1

上篇 从“士宦禅隐”到“贬官禅悦”

——大历、贞元年间的“慕仿”诗风 / 1

中篇 “贬官禅悦”的诗性高蹈

——元和诗子浓郁的个性风采 / 37

下篇 由“禅悦”而“逃禅”

——“会昌法难”先后诗歌写作浊重的人工气息 / 113

附录

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 / 207

诗僧禅门原微 / 219

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从王维到苏轼 / 232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 242

佛禅的人生观和苏轼生命历程的审美化 / 253

《牡丹亭》和明代狂禅风潮 / 266

《苦瓜和尚画语录》的佛禅底蕴 / 274

后记 / 285

上 篇

从“士宦禅隐”到“贬官禅悦”

——大历、贞元年间的“慕仿”诗风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唐代前期^[1]，诗人灿若星汉，诗作浩如烟海。多样的风格，不同的题材，都以其独特面目闪耀着大唐帝国的风采。文学史家认为唐初诗人锐意革新、奋勇实践，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他们为时代所鼓舞，强烈的自信心表现为诗的激情与生气，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开元、天宝年间，直到“安史之乱”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荣、艺术青春气息颇为浓郁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期待，到此间终于达到了全盛的巅峰。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天资卓绝的诗人，其中有全唐最优秀的“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人们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经历曲折、丰富，体验深刻、独到。时代赐予慷慨、丰厚。因而，诗人获得了热爱生活、干预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之于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之于现实与理想的理解与感悟，都在诗歌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多种多样的题材中，最足以代表唐诗面目和水平的是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前者多是诗人功名事业的艺术传达，后者乃诗人追求自由人生的内心外化。从根柢上说来，建功立业的诗情只能澎湃于某些特殊的时代，或某个时代的特殊时期，而对自由人生的追求、憧憬、期待及其艺术传达，则相对更寄诸久远。所谓“边塞诗人”者，俱有亲和自然、描绘田园的看家本领。例如长于“边塞诗”的王昌龄，虽也以闺情宫怨和离别诗见著于世，文学史上却少有人谈及其“田园”造诣。其实，他得益于陶渊明的田园旨趣颇深。《唐诗归》称“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细读储光羲及王昌龄诗，深厚处益见陶诗渊源脉络。善学陶者宁从二公人，莫从王、孟人”。比较而言，“边塞”诗情消歇却是不可避免的，即或是高手、代表作家。例如高适诗云：“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平芜。可叹无知己，高阳一（一，又作忆）酒徒。”《旧唐书》说：